

我们坐在 高高的谷堆旁边

一部个人记忆农村过去年代的力作，

对历史的见证与对记忆的追寻并置，

对痛感的记忆、体验和反思并存，

弥补了集体记忆的某些缺损。

王方
著

文匯出版社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王荣方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 王荣芳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496-0847-8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5355 号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作 者 / 王荣芳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 晋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8.25

ISBN 978-7-5496-0847-8

定 价 / 35.00 元

谨以此书

纪念父亲王汉文诞辰九十周年

自序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实质上写的是1966年至1976年这一非常历史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一“三农问题”。至于读者读了该书后是怎么认为的，那是读者自己的事。

1966年至1976年，年年有政治运动，一场运动还没完新的运动又来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共同要求是：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人人过关。这些政治运动的共同特征是：一刀切。一边倒。折腾。为什么会搞这么多的政治运动？因为不停地搞政治运动，是阶级斗争思维的使然，是人民战争思维的使然，是革命党思维的使然。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政治运动？因为不停地搞政治运动，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路径选择和手段选择。那么，搞这么多政治运动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有效地掌控和领导国家政权。

然而，这10年中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给农村、农业、农民带来了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书中通过43件事的记述，已作了回答。如果在这篇自序中还要说的话，我就只能概括之：这10年，非但没有解决好“三农问题”，反而使“三农问题”更复杂，更糟糕：农村旧貌难变，农业效益低下，农民不能温饱。更甚的是，这10年的政治运动，给农村社会造成了难以治愈的最大隐痛：农村传统文化的断层和农民价值观的扭曲毁弃。

我常想这样一些问题：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农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砸锅卖铁也要支援解放军？1950年代初，农民很穷，为什么会热情高涨地捐粮捐物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980年代初期的短短三四年，为什么就解决了建国后长时期无法解决的农民温饱问题？进入21世纪后，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为什么接连不断？

答案就在于：土地。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老解放区农民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支援解放军？因为作

为革命党的中共摸准了农民的心思，把准了农民的脉搏，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同样，刚执政的中共，在新解放区及时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广大的新解放区农民也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积极热情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忠心地保家卫国。然而，在长达 20 多年的人民公社化时期，为什么始终解决不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而在 1980 年代初期的短短三四年中，就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根本还在于土地。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既没土地的所有权，也没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农民与土地无缘，不搭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虽不拥有土地，但农民可以自主地经营土地，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管，完全由农民做主。这样，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地也种得好了，温饱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

那么，进入 21 世纪后，为什么农民群体性事件接连不断？根本仍在于土地。为了建设开发区，为了加快城镇化，土地被低价征用，农民住宅被低标准补偿拆迁，千百万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据媒体披露，在一些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里，竟然出现了“楼上养猪养鸡，天然气灶旁烧柴做饭”的荒唐景象。你说，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的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无地种，无工作，无社保，面临着生存危机时，他们能不“造反”？能不“闹事”？

“三农问题”，对中国而言，太重要了。要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由国内消费、服务、创新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要点在“三农”。要在 2020 年左右使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在 2050 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三农”。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长盛不衰，根本在“三农”。那么，中国“三农”的现状怎样？概括之：农村落后，农民贫困，农业脆弱。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精心设计和有效施行能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全新的土地改革制度。

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资本精英，一切有识之士，所有想对社会有担当的人，应该而且必须多想想“三农问题”，务必处理好“三农问题”。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一个民族的良心。

最后，让我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的扉页上援引的题词，作为这篇自序的结束：

我已经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12 年 11 月 6 日于江阴

目 录

自序	001
引言	001
第1章 因为值饭	011
第2章 鲜艳的红领巾	017
第3章 大字报	022
第4章 破四旧	028
第5章 要求革命	033
第6章 恐怖的斗批会	039
第7章 红宝书	045
第8章 早请示,晚汇报	050
第9章 游街示众	055
第10章 母亲哭着摔碗	061
第11章 复课闹革命	066
第12章 宣传毛泽东思想	071
第13章 忆苦思甜饭	076
第14章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082
第15章 斗批“李戚黑爪牙”	087
第16章 “九大”风雷急	093
第17章 斗私批修会	098
第18章 社员评论共产党员	104

第 19 章	办学习班	110
第 20 章	上初中后	115
第 21 章	学习金训华	121
第 22 章	打击投机倒把	128
第 23 章	政治学习雷打不动	134
第 24 章	申港朝北台	140
第 25 章	我们村通电了	146
第 26 章	大寨式评工分	151
第 27 章	人性论的被批判	157
第 28 章	坊间秘闻	163
第 29 章	都是日记惹的祸	168
第 30 章	为上高中而奋斗	177
第 31 章	加入共青团组织	184
第 32 章	对林彪的批判	190
第 33 章	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196
第 34 章	开门办学	202
第 35 章	殴打贫下中农事件	209
第 36 章	师道要不要尊严	215
第 37 章	爱情与龙江	222
第 38 章	农村干部	229
第 39 章	移风易俗	235
第 40 章	转弯子	242
第 41 章	割资本主义尾巴	249
第 42 章	建设大寨县	257
第 43 章	父亲宣布退休	263
结语		271
自跋		280

引言

(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上层出不穷地出现了这热那热,同学聚会热就是其中一热。我多次参加过大学同学、高中同学聚会,还数次参加过初中同学聚会。阔别三四十年的再相见,大多数同学已面目全非,不敢相认了,但一谈起在学校里的一些事,又都清晰地历历在目了。我们这些同学,大都出生于 1950 年代中期,因此,在忆往昔时,话题往往离不开“文革”。“文革”爆发时,我们大都读小学三年级,至初、高中毕业,一直在“文革”期间,除了读一本“红宝书”外,没有读过一本像像样样的书,没有完完整整地上过一天学,大多是早上八九点钟上课,11 点吃中饭,下午 1 点多上课,3 点放晚学,其中还要参加学校召开的批这批那的批判会,还要参加年级、班级组织的“斗私批修”会,还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军、学工、学农等活动。屈指数来,我们真的没能好好地上过几天学。所以,初、高中同学相聚时,同学们都有一点愤懑,他们如今大多生活在农村,收入低,生活得不够有尊严。每一次同学聚会后,我都无法克制地要忆起一些往事,思考一些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江阴实施沿江开发战略。我老家申港被规划为江阴临港新城核心区。伴随着大开发大建设而来的首先是大拆迁,是整个村庄整个村庄地大拆迁。在这大拆迁中,我曾读过的小学、初中被拆掉了,我曾读过的高中被改建了,与中心小学挤在了一起,而且两所学校都被改姓换名为同一名字:江阴临港新城实验学校。本来,学校是传承具有 2 500 年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申港”两字的最好载体,但在大拆迁的城镇化中被去“申港化”了。这是不是有点与

“文革”时期把本来富有历史文化涵义的地名一下子改名为“向阳”、“朝阳”、“卫东”等富有政治革命色彩的地名(1980年代又恢复了原名)的做法相似?甚或与台湾地区前总统陈水扁在任时急着“去蒋化”和“去中国化”的做法也有点相似?这真有点不好说。还是让时间、让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我读过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被拆后的彻底消亡,在我心里滋长了一种持久的隐约的疼痛感和一种像没有了娘的孩子的失落感,因为她们是我青少年时期成长的摇篮,因为她们是我张帆开始人生旅程的极其重要的锚地,因为她们仍是我个人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她们是我个人生命史中的一段重要的链接。因为如此,我心中怎么不会没有疼痛?我心中怎么不会没有失落?什么叫母校?在我看来,母校就是只准我说她不好,但决不允许他人说她不好。谁说她不好,我会跟他(她)拼命。这或许是另一种恋母情结吧!现在母校没了,好比没了母亲,我心中怎么不会没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和疼痛?

更让我心里疼痛和失落不已的,是生我的血地——王家垫自然村被拆。

那是2009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小弟国方打我手机,说家里房屋要被拆迁了,他要我务必于第二天上午回家,商量有关拆迁事宜。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我回到老家时,只见镇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已在丈量计算房屋面积了。关于老家房屋拆迁,我和小弟之间没有多少事宜可商量,一切按拆迁规定办理就可以,要商量的是80多岁母亲的安置问题。我母亲跟小弟生活在一起已有二三十年了。母亲听说房屋要被拆迁,死活不肯搬家。小弟呢,联系了几家租房人家,他们只同意将房租给我小弟他们住,但不同意我母亲跟小弟住在一起。他们的理由是说我母亲已经年迈了,住到他们家后万一……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吉利的。小弟说他没有什么办法了。

我一边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一边去镇里找有关领导(我在市级机关工作,平时跟他们比较熟)商量安置办法,商量来商量去,得出的一个比较好的结论是,让我母亲住到镇敬老院去。可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我和小弟房屋的拆迁安置费,还抵不上我母亲入住敬老院的费用。我小弟心中不平,认为太亏了。可一位镇领导说,这没办法,被拆迁的人家太多了,镇里顾不过来,也不好随意开口子,这是没办法的事。无奈,为了支持镇里的拆迁工作(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之前,我被镇里叫回去了3次去做小弟的工作),我跟哥、弟商定:关于母亲入住敬老

院的费用,我承担 60%,小弟承担 30%,哥承担 10%。这里,我无意也根本不想评说拆迁工作中的是非曲直,我只想说两层意思:第一,先打个不确切的比方。政府搞拆迁,腾土地,高价卖土地,好比是在与老百姓做生意。既然是做生意,就该遵守做生意的规矩:买卖公平。然而,在拆迁过程中,就政府的收益率与老百姓的收益率来说,政府的收益率起码是老百姓收益率的百分之几百,而且政府只管拆迁不管拆迁前的安置。第二,大拆迁,或许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因此,城镇化进程中就有不道德、不人性的一面。我期盼,在城镇化进程中,这种不道德、不人性的东西,要少些,再少些。

可能有点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

我把让母亲住到镇敬老院的想法告诉母亲后,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按理说,我是决意不去敬老院的,我又不是没有儿子。可拆迁,又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这是政府的事。为了支持政府,我就不计较什么了,去敬老院住就是了。我们没想到,母亲是如此豁达,如此达理!我当时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噢,我几乎忘了告诉读者,在生产队期间,我母亲常年是妇女队长,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呢。还有,在我担任生产队队长时,母亲是妇女队长,是我的助手。

2010 年 1 月 3 日上午,我和小弟把母亲送到镇敬老院居住。之后,老家陆续被拆……我几次回到老家,缓步在被拆迁后的废墟上,寻找我母亲亲手种植在老屋后的苦楝树,寻找我儿时欢快戏水的河水碧清荡漾的池塘,寻找村中第一次倒映出我本来面目的那口百年老井,寻找我青少年时代留在故里的梦,凝神谛听我在成长路上的痛哭声和欢笑声……

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叫王家垫,据三槐堂夏浦王氏家谱记载,我村的祖先王文瑞于清朝康熙十四年(1675)左右由夏港於王村迁徙至申港王家垫,至 2009 年已有 334 年历史。在我记忆的底片上,老家曾经的模样是:大体有坐北朝南的 3 长排房屋,有房屋近百间,似一个“川”字,又似一个“三”字。村的东北角上有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的池塘,叫东沟头;北面有一条通长江的用于农田灌排和船只运输的漕河;西南角上有一圆池塘;南面也有一圆池塘,叫门口头河;东边有一口百年老井,老井南边有一条大路,东西走向,通向申港集镇。

我在老家学习生活了 20 年。我的母校、我的老家对我来说,就似我血脉相承、骨肉相连的亲人,突然,他们故去了。那么,作为活着的我这个工作在外的游

子,该为老家做些什么?我想不管老家对得起过我对不起过我,只要对老家有益的事,我就做。为了记住老家,为了纪念老家,为了祭奠老家,为了告慰我的先人,于是,我决定写《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作为我对故去的母校、故去的老家的一种定格,一种备忘,一种备份,一种怀念,一种相思。

这就是我决定写《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的起因。

(二)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是我对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听过、见过、做过、知觉过和感受过的事情的记忆,而不是回忆。

我不是在咬文嚼字。

记忆不同于回忆。

回忆,只是回想自己或他人所经历的事,只是将碎片化的东西通过回想或联想后形成完整的東西。假如是回忆录,大都是记述一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自己哄自己开心的一些事。

记忆,只记住自己听过、见过、做过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完整的事,是复活或再现一个人以前的生活,具有主动再现过去的力量。同时,记忆还与道德有关,因为只有依靠记忆,一个人才能产生悔过之心。一切遗忘都是不道德的。所以,努力记忆自己曾经听过、见过、做过的事情,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

记忆的精华就是那些超越了时间的东西。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记住过去,是因为记忆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因为在自然当中,各件事情无不与时间密切相连,而在人的精神当中,各件事情却已经战胜或超越了时间。而那些超越了时间的东西,都是每个人感兴趣的東西,具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只能记住对他(她)具有某种价值的东西,即使他(她)并未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因此,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受时间限制,唯有那些超越了时间限制的事情,才具有绝对的价值,因而才能构成文化的力量。而能受到记忆的保护、能把记忆从时间的巨鳄中拯救出来的,唯有那些具备了绝对价值的东西。这些具备了绝对价值的东西才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灵生命之中。并且,记忆唯有

以整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才能彻底地征服时间。

所以,记忆是一个人的一种意志活动,是人性最深层的构成部分,是一个人最具独特品质的一种表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就是我记忆的一种整体形式。它记忆的是我八九岁至20岁间亲见、亲历、亲为的一些好玩的闲事。但这些好玩的闲事,对我来说,我认为是有点价值的。那么,我为什么只记忆1966年至1976年间的一些闲事,而不从1956年我出生时记忆起呢?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这部书既不是回忆录,也不是自传;二是我记得往事的岁数,大概也差不多是从上小学起开始的吧。我这样说,是有理论依据的。20世纪初奥地利伟大的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其划时代的巨著《性与性格》(2011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中说:“在极端的情况下,天才者的记忆能溯及到自己三岁的时候,非常完整,栩栩如生,而大多数常人的记忆却只能从他们比三岁晚得多的时候开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只记得自己八岁以后的事。”

我是魏宁格“认识一些人”中的一个,所以记事时的岁数比一般人要大。同时,我记事晚,还是有我两岁时生的一场大病造成的。请恕我慢慢道来。

我外婆生前不止一次说过这么一句话:“荣方这条命,硬是汉文(我父亲)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我母亲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么一句话:“老三(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是一个很难养的孩子。”我外婆的话,怎讲?我母亲的话,又怎么分解?

还是让我饶舌地从头说起为好。

1959年春天,3岁不到的我突发脑膜炎病,先是高烧不退,后来频频抽搐,直至昏迷不醒。因当时家境贫寒和农村医疗水平的低下,虽看了两次医生,但无济于事,见我昏迷了3天后,心急火燎的母亲一边叫来我的外婆外公,一边托人捎口信,叫我父亲迅速从张家港河工地上回家。我外公外婆来到我家后,就开始忙我的“后事”了。外婆用我姐的一件半新的外衣,改做了一件给我穿的“老”衣;外公则用稻草编织了一只草窠,权作下葬我的“棺材”。草窠编织好后,外婆为我穿上“老”衣,外公帮我“入殓”,将我抱放到那只“棺材”里,并盖上了盖,只等我父亲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后,将我埋葬。

我“死”一般地躺在“棺材”里,静静地等着我父亲从张家港河工地上赶回来

见我最后一面。据后来外婆告诉我说，我父亲回家时，是我“入殓”后的第二天晚上11点多钟。父亲一跨进家门，直奔我“棺材”前，揭开盖头，将我抱起，搂在胸前，拼命地跺脚，拼命地喊我的名字，拼命地搓揉我……在父亲一系列的“拼命”中，我居然在父亲的怀抱中，“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抱着我的父亲，听到我“哇”一声后，虚脱般地瘫坐到地上，并“呜呜”地哭将起来……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晚为了回家看我最后一眼，耽误了功夫，在开河工地上被拔了“红旗”，插上了“白旗”，遭到了当时一位公社领导的训斥，骂我父亲是“把儿子的生命看作比实现共产主义还重要”的右倾分子。但我父亲说，为了儿子的命，他被领导批了，骂了，罚了，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父亲把我的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父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死而复生后没过几个月，人民公社办的大食堂就解散了，广大公社社员再也不能“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了，只能勒紧裤带，吃糠咽菜，艰难地度过3年极其艰难的日子。在这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因饥饿，因没营养，我的身体更加虚弱，大病没有，小病则不断。母亲为了给我看病，卖掉了她的银戒指、银手镯……据母亲后来对我说，我四五岁时还不会开口说话，到6岁时才会说话，还口吃毛病很重，说一句完整的话要费老半天时间，而且我记性很不好。

母亲的二舅姆健在的时候很喜欢我。逢年过节时，母亲总要领着我去她家。每次去，她总要把一些糖果（当时能吃到颗粒糖是很不容易的）塞到我裤袋里。我呢，也很嘴甜地叫她“二舅婆”。二舅婆待我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1966年正月初二，我和母亲及我大舅等五六个人去我母亲二舅姆家拜年。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但气温较低。我们在她家吃了中饭，到下午3点多钟，又吃了点心。吃点心时，二舅婆又让我大舅喝米酒。我大舅酒量不怎么样，但拂不过二舅婆对他的盛情，也就喝了，一喝就喝了3汤碗，结果，就趴在桌上站不起来了。母亲和我大舅妈等人就先回家了，我硬被二舅婆留下来住在她家，说是要我陪陪我大舅。晚上，我和大舅睡一床（是唯一一次我和大舅同睡一床），只听见大舅打了一夜的呼噜声。我呢，则在走马灯似的老鼠窜跑时发出的“吱吱”声中慢慢睡去。

初三吃早饭时，大舅坐朝南位置上，我坐在朝东位置上，二舅婆坐在朝北位置上。我和大舅面前是各人一碗红枣汤，二舅婆吃的是淡泡饭。大舅跟他二舅

姆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开始吃了起来。我则迟迟不动筷子。我不敢吃。我心里很紧张。我想，大舅吃红枣，是因为他是我大舅，我怎么能和大舅一般大小呢？见我不动筷子，二舅婆对我说，荣方，怎么不吃？我有些发窘地站起来，端起红枣汤碗，递到二舅婆面前，说：“二舅婆，你吃。我人小，不能吃。”

大舅听后，把碗往桌上一放，笑着说：“荣方，二舅婆给你吃红枣汤，是看得起你。你看，你的待遇和我一样。”我大舅说话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话时右眼睛眨个不停。“荣方，你今后要好好谢谢二舅婆。没有她，你也就不可能在这里吃红枣汤了。”

我听了大舅这一席话，似淋了一头雾水，一点也不明就里，就眨着两只眼睛，望着二舅婆，巴望着她说说我为什么要好好谢谢她的事。二舅婆也把泡饭碗放到桌上，接过了大舅的话头。“荣方，你这个孩子小时候真难养。你可能不知道，你5岁的时候，你父母是一心想把你送给别人家养的。我知道后，就多次劝说你父母，特别是你爹，不要将你送入。那时候，你父母过得很艰难，你呢，整天生病，但他们没钱给你治病，又没人照顾你……唉，是我好说歹说，才说服了你爹。我对你父母说，荣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根生（我大舅），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二舅姆，你说得没错。荣方这孩子，就是顽皮了一点，但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好，年年有奖状。”大舅说。

“是啊，老话说得好，‘从小看看，到大一半’。”二舅婆说，“荣方现在这么用功，说不定今后也能到大城市里去上学、上班，做个城里人。”

听了大舅和二舅婆的话后，我才明白母亲说我“很难养”是怎么一回事。

正因为我“死”过一回和“很难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既影响了我的智力，又影响了我的记事能力。所以，我从上小学起才能真正记事，就不足为怪了。

（三）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东方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情》等歌曲，是我们常唱的歌曲。可以这样说，我和我的同代人，是听着和唱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长大的。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生活都在两只手上，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地跌倒在雪地上，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盼到今天的好光景。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母亲唱给我听的，严格地说，是母亲哼给我听的。我分明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天空中繁星闪烁，天很闷热。夜幕降临，社员收工后，家家户户在家门口搁着门板，一家人围坐着吃晚饭，然后坐在门板上纳凉。我家门前是一片打谷场。打谷场上堆着几大垛高的小麦谷堆。这些麦谷要等生产队抢时间栽完秧后再脱粒。吃过晚饭，我父亲、哥、姐，扎堆乘凉去了。母亲坐在门板上，我仰躺在门板上，头枕在母亲的腿上，母亲一边不急不慢地摇着扇子为我去热赶蚊，一边哼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在我母亲哼这首歌的时候，在打谷场的东头，随着晚风，也传来我姐和她的小伙伴们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声。这首歌在当时，妇孺皆会唱。

我听着母亲哼着《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悠扬、凄美、抒情的歌，慢慢地闭上眼睛，进入梦乡。突然，在熟睡中，我感到脸上有一个冰凉的东西在蠕动，我被这蠕动的冰凉的东西弄醒了。我睁开眼来，听到了母亲的幽咽声。我一骨碌从门板上爬起来，搂住母亲的脖颈，将我的下巴搁在母亲的左肩上，左脸紧贴着母亲的左脸。母亲轻轻地拍了几下我的屁股，然后将我搂到她的怀中……上小学前，我也会不完整地哼《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了。上小学后，老师教会了我们唱这首歌。

用《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作书名，一是说明本书记的是已过去的在农村发生的事——我故乡发生的事；二是展示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19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这代人，正在长身体、长知识时的成长环境；三是再现我

故乡曾经展现的历史模样。

那时候,不知愁是什么滋味的我们,常常鲜活地蹦跳着,歌唱新社会的新生活,尽管在过年时,我们还不能穿上新衣裳,但我们还是感到生活的甜蜜、幸福。然而,从我记事起,我就不解母亲为什么没有土地?在生产队里,她每天“鸡叫做到鬼叫”,背向皇天面朝地,累死累活还吃不饱肚皮,穿不上一件像像样样的衣服?到我离开老家去苏州上大学时,村上的房子80%以上还是1949年以前建造的。解放27年了,老家为什么仍然面貌依旧?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学校经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每次请来一个老农民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他们说着说着就说,旧社会是苦,但是肚皮还是能吃饱的。老农民话一出口,我们就大笑不已。还有,我们经常写批判文章,按老师的吩咐,批判林彪所散布的中国人“缺吃少穿”的反动谬论……所以说,《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歌声,让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由歌声渲染的号称“敌人一天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的宏伟且不可及的幸福的世界;一个是我们过着长达20多年不能温饱的现实世界。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激情满满地对未来充满希望。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的时代,是一个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前行,在前行中遭遇重大曲折和严重挫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激情就像燃烧的干柴,真能烧毁一个(假如真的有一个)旧世界。我们在激情中干过蠢事,在虔诚中干过错事,在反思中日趋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

然而,有时当我把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亲见、亲历、亲为的一些事讲给我孩子听时,他们睁大着眼睛,简直不相信,以为我是在讲“天方夜谭”的童话故事;有时当我们同代人忆起我们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事情时,有的人“瞒着毛边说光边”,把自己说成是真理的化身,有的人则三缄其口,有的人则干脆反对提往事,有的人则含糊其词……

唯有人才有历史。有了人的历史,才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

每个人的历史,是不可能有空白处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样如此。

谁要是在历史面前闭上眼睛,谁就看不清当前和未来的问题和方向。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